

# 论毒品定义要素的立法选择

靳澜涛

(北京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定义要素是从定义中抽象出的最本质属性与最鲜明特征,是厘清法律概念明确性与适当性的重要参考,须满足客观性与规范性两大要求。毒品定义要素作为明确国家毒品管制必要性的前提和保障公民预测可能性的基础,在客观性与规范性的彰显上却略显乏力。一方面,反思传统的毒品定义要素,“成瘾性”只是毒品列管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违法性”仅是立法者对业已存在的毒品的法律评价,只有“危害性”才能揭示毒品的客观属性。另一方面,毒品的界定实际上是一种以权力为基础的甄别,不仅涉及拟管制物质的客观属性,还包括滥用规模、历史渊源、社会容忍度等规范属性。在融合两大主流定义模式的基础上,毒品的立法定义应体现为客观要素与规范要素的集合,在确保国家毒品管制秩序的基础上尽力保障公民权利。

**[关键词]** 毒品;笑气;定义;禁毒法

**[中图分类号]** D924.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7)06-0048-05

近日,中国赴美留学生因吸食笑气成瘾导致瘫痪的事件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sup>[1]</sup>据2016年全球毒品调查数据显示,笑气的使用人数超过多数常见毒品,位列第七位。<sup>[2]</sup>在媒体与舆论的裹挟下,“笑气是否应该列管为毒品”已经从一个专业问题演化为公共话题。毒品在立法层面蕴含着强烈的否定评价意义,如果单纯依靠司法或行政审查来判断笑气的毒品属性,显然无法保障公民的违法性预测,更难以解决其他新型毒品的定性难题。在禁毒立法中,只有明确毒品的定义要素,向社会明确告知毒品的识别标准,才能指示法律管制的涵摄范围,彰显国家权力介入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因此,厘清毒品定义要素既是禁毒法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命题,也是禁毒立法工作的首要任务。

## 一、毒品定义要素的理论界定

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sup>[3]</sup>法律定义是指“人们在不断地认识和实践过程中,对具有法律意义的现象和事实进行理性概括和抽象表达而形成的一些权威性范畴或术语”。<sup>[4]</sup>以“毒品”为例,其本质就是一种药品,恰如英文中“drug”一词涵摄“药品”与“毒品”两层语义。一旦经过国家的法律确认,形成特定的“法律术语”,“毒品”就被赋予了

否定评价色彩,彰显了国家权力对市民生活的干预。但是,由于立法定义的抽象性和现实毒情的复杂性,单纯依靠空洞的定义显然难以精准适用法律,无法明确告知公民法律处罚对象和范围。所以,有必要从定义中提炼出若干关键词项作为“定义要素”,既成为深刻揭示法律概念本质内涵的必需要件,也作为快速判断法律概念外延的衡量标准。所以,其作用体现为“概括”和“识别”两个方面,恰如著名法学家哈特所归纳的两项使命,“一是通过提供一个代号或公示来把被定义的词转换成其他易懂的用语,二是通过提示该词所涉及的事物的特征(使之与其他种类事物区别开来)”。<sup>[5]</sup>就毒品定义要素而言,“概括”是指毒品定义要素应清晰揭示毒品的最本质属性与最鲜明特征,“识别”则指毒品定义要素是判断某一物质是否为毒品的关键,从而决定是否对应禁毒法律的规范构成要件,直接关系到关联行为(吸食、持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等)是否违法。

正是基于法律定义要素的概括与识别的功能定位,它须体现为客观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具体而言,法律定义要素固然是对客观对象直接或间接的反映,“但又不是是一种简单反映,而是立法者根据立法意旨,对那些认为需要通过规范形式予以保护或

**[收稿日期]** 2017-07-28

**[作者简介]** 靳澜涛(1993—),男,安徽巢湖人,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禁毒法学、行政法学、警察法学。

禁止的行为反映。”<sup>[6]</sup>这对毒品定义要素的选择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定义要素须真实反映毒品作为一种化学物质的自然属性。医学和药理学的发展揭示了毒品的化学结构以及对使用者生理、心理的作用方式,立法者首先是“通过内在的审视来考虑和提炼我们的日常知识”<sup>[7]</sup>。因此,毒品定义要素的厘清势必自毒品的物质属性入手。另一方面,定义要素须揭示毒品作为一种规范概念的人文属性。“法律的实质合理性要求其符合道德考虑、功效、便利和公共政策。”<sup>[8]</sup>毒品之所以进入法律视野并被严格管制,不仅基于其化学结构、药理性质、医疗效用等自然属性,还掺杂了泛滥历史、滥用规模、社会容忍度、司法资源等人文因素,方能彰显毒品作为一个法律信条学概念,本质是一种以权力为基础的规范甄别。

目前,理论界在研究毒品的管制依据、制度、措施等方面着力颇多,但对最根本的法律定义问题,则鲜有学者涉及,导致对“笑气”、“新精神活性物质”等新型成瘾物质的法律定性分歧较大。虽然有学者论及毒品概念的立法界定<sup>[9]</sup>,但局限于实定法中麻醉药品与精神药品二元划分的窠臼,折射出客观认知与规范认知的失衡、医学标准与法律标准的混同。“二元化界定模式面临着外延界定不周、划分标准单一、刑事责任模糊、行政处遇僵化等现实困境,早已不再适应禁毒斗争形势的需要”。<sup>[10]</sup>因此,厘清法律定义要素的理论内涵、功能定位、基本特征,特别是把握客观性与规范性两大基本要求,为分析毒品的法律定义要素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工具,进而有利于结合实践指出现行禁毒立法中存在的欠缺之处与完善方向。

## 二、毒品定义要素的立法比较

法律定义要素是厘清法律概念明确性与适当性的重要参考,须满足客观性与规范性两大要求。但是,比较世界主流的两种毒品定义模式后发现,列举式定义不涉及毒品的定义要素,直接采取简单罗列的方式说明法律所管制的对象,难以体现客观性要求。概括式定义的规范表达中虽暗含毒品的定义要素,但在缺乏明确解释的前提下,对医学标准的过度依赖导致规范性不足。

### (一)列举式立法难以体现客观性

列举式立法通过目录或附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毒品的范围和种类,设置了公民的法律义务,彰显了国家鲜明的管制立场。此外,针对不断出现的新型毒品种类,上述国家往往无须通过固定的立法标准予以逐一识别,仅需将该类物质添附于毒品目

录便可实现刑事制裁或行政管制。以英国为例,1971年的《滥用毒品法》采取列举式定义,将毒品专门规定在其第二个附表第一、二、三部分中,并区分为A、B、C三级。此范围与分级并非恒定不移的,“毒品滥用咨询委员会”可在获得国会批准后添加或调整。<sup>[11]</sup>但是,列举式定义停留于形式上的定义,缺乏对毒品定义要素的规定,使其难以揭示毒品本质的自然属性,“无法与其他药品或嗜好品相区别”。<sup>[12]</sup>一方面,公民对于“列举物质非法性”的认识仅仅基于列表的添附,无法明确国家对毒品否定评价的正当性,也难以保障违法性预测可能。另一方面,定义要素客观性的缺位使得毒品列管缺乏统一、科学的标准,直接决定了列举定义只能通过目录中逐一添附的方式扩大管制范围,缺乏相对的弹性或前瞻性。实践中,列举式定义的列管速度显然滞后于毒品种类的翻新速度,特别是随着刻意规避管制的新型“策划毒品”的出现,更对这种定义模式造成了空前的冲击。

### (二)概括式立法难以体现规范性

在毒品定义的概括式立法中,一般会对毒品定义要素作出说明,归纳法律将该种物质列管为毒品的参考标准,揭示法律管制的正当性。例如,我国《禁毒法》第2条对毒品的界定是,“本法所称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通说认为,该条强调了我国毒品定义的三大要素:成瘾性、违法性和危害性。<sup>[13]</sup>类似地,我国台湾地区将“成瘾性、滥用性、社会危害性”作为毒品定义要素。采取概括式立法的国家较为重视毒品定义要素的价值,重视惩罚毒品正当性依据的说明。但是,由于大多数国家在具体要素的选择上缺乏明确解释,对医学标准的过度依赖导致法律定义本身在解释论上呈现出规范性的欠缺。许多国家或地区在禁毒立法中将“成瘾性”作为毒品定义要素之一,且大多建立于医学标准之上。但是,毒品既然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规范概念”,决定了立法定义中的成瘾性要素立足于却远高于医学认定标准。例如,在美国,大约90%的居民惯于饮用咖啡和其他含咖啡因产品,全美12岁及以上人群中,约有四分之一有吸烟的习惯,大约三分之二的成年人经常或偶尔饮酒,不过几乎没有立法例将咖啡、烟草、酒精与毒品并列管制。<sup>[14]</sup>美国著名的麻醉毒瘾专家科尔布甚至指出,大麻引起的陶醉远不如酒精致醉那么危险。<sup>[15]</sup>可见,单纯从成瘾性角度很难区分毒品、烟草与酒精,难以合理揭示毒品

管制的正当性。因此,概括式立法模式虽然对于毒品定义要素作出了说明,但过于重视毒品的自然属性,使其难以符合法律定义要素的规范性要求。

### 三、毒品定义要素的立法选择

厘清毒品定义要素既是禁毒法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命题,也是禁毒立法工作的首要任务。笔者认为,既然概括式与列举式各有利弊,二者应予以一定整合,通过“概括+列举”的方式界定毒品定义,而连接抽象定义与毒品目录的关键正是毒品定义要素,它应体现为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的集合,在确保国家毒品管制秩序的基础上尽力保障公民权利,避免立法的任意和擅断。

#### (一)融合两种典型的定义方法

近年来,随着概括定义与列举定义的弊端日益凸显,基于互相借鉴和弥补的需要,许多国家将两种模式融合,形成了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一方面,鉴于列举式立法中客观性的欠缺,列举定义的国家也对毒品进行抽象归纳。例如,新西兰在1975年制定的《毒品滥用法》中将毒品定义为“任何改变人的正常行为方式的物质、用于制作毒品的物质和含有有毒物质的混合物,并具有吸食成瘾性。”<sup>[16]</sup>另一方面,鉴于概括式立法中规范性不足,许多概括定义的国家通过授权其他专门机构制定专门的毒品目录。例如,我国于2005年出台了《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并在该条例第3条中将“麻醉药品与精神药品目录”的制定、调整和公布再授权于药监部门、公安部门和卫生部门。

在两种模式融合的基础上,定义要素担当着衔接概括定义与列举定义的重要任务。一方面,在形式上,无论是抽象的毒品概念还是具体的毒品目录,均应体现在同一的禁毒法典中。因为,毒品的定义对应禁毒法的规范构成要件,直接关系违法行为是否成立,关系到此罪与彼罪的认定,甚至关系到死刑的适用与否。纵观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立法经验,鲜有通过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例,通常由禁毒专门法典予以明确。另一方面,在实质上,毒品目录中的具体品项应当符合抽象的毒品概念,方可实现内涵与外延的相对一致。二者衔接的关键在于毒品定义要素,它揭示了毒品抽象概念的最本质属性与最鲜明特征,也相应成为衡量某一物质纳入毒品目录的正当性依据,特别是在采取毒品分级制的立法例中,毒品定义要素通常作为分级的参考标准。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在《毒品危害防制条例》第2条关于毒品的抽象界定中,直接将“成瘾性、滥用性及、社会危害性”三大定义要素落实在实

定法的规范文本中。当发现有新兴滥用物质时,由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同样依照上述三大要素决定非医疗用途的药物是否列为毒品。<sup>[17]</sup>

#### (二)甄别毒品定义的客观要素

在传统理论中,成瘾性、违法性和危害性是三大公认的定义要素。经过仔细甄别后发现,“成瘾性”只是毒品列管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违法性”仅是立法者对业已存在的毒品的法律评价,应该从予以排除。只有“危害性”才能揭示毒品的最本质属性,彰显了法律定义要素的客观性。

第一,“成瘾性”本身只是毒品列管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对“成瘾性”的关注仅仅源于其演化出外部效应,即导致社会危害性才迫使法律介入毒品管制。如前所述,将成瘾性作为毒品的定义要素,难以解释“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物质较多,为何仅将毒品列入管制范畴”的现实问题。此外,公民追求物质依赖或成瘾的效果,并非必然触发法律否定评价并强制干预。有鉴于此,在坚持“成瘾性”标准的国家中,许多都在立法上做了符合上述分析的扩大解释,将“成瘾性”从“习惯性使用毒品”延伸至“因此对公共安全、健康、道德造成危害”或“由此丧失自我控制能力”。因此,“成瘾性”这一要素可以通过解释论的努力纳入“危害性”范畴,而难以独立作为毒品的本质属性。换言之,“成瘾性”属于附属性要素,而非前置性要素。

第二,“违法性”是立法者对业已存在的毒品的法律评价,无法揭示毒品的最本质属性,应予以排除。“违法性”表明了毒品实际是一个以权力为基础的规范甄别和认识,不能纯粹付诸毒品的物质属性以建构毒品的概念,恰恰映应了法律定义要素的规范性。但是,形式上的不法只是规范评价的表象,未能揭示背后所要保护的法益内容。正如德国法学家李斯特所言:“一切法律均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制定的。制定法律的宗旨就是为了保护人们的生存利益。”<sup>[18]</sup>毒品定义要素的规范性旨在强调法律对毒品的评价基于却高于医学标准,即毒品的法律界定应是自然属性与人文属性通盘考虑后的结果,而这种结果的呈现方式就是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毒品的内涵或外延。“违法性”只能说明规范评价的最终呈现状态,而未能体现立法者思忖的具体标准。

第三,“危害性”直接揭示了毒品的最本质属性,是其定义的首要因素。各国立法例中,大多将该要素作为毒品界定或分级的依据,具体表述形式略有差异,譬如加拿大《受限制的药品和化学品法》

中的“社会危害性”、新西兰《毒品滥用法》中的“社会损害程度”等。但是,厘清毒品的危害性之范围,需要慎重考察毒品的物质属性和法律规范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法益侵害性只能在其直接相对的法益中寻求,而不能无限的推演。一方面,毒品的危害性只能以其物质属性和通常使用方式为基础评定。我国大多数学者将毒品本身的危害性与过量使用后所造成的危害性混同,<sup>[19]</sup>这样分析并不妥当。毒品本身的毒害性是在一般状态下使用而产生的,指其物质结构和属性能够改变人体组织机能的正常状态,不同于以大量使用为特征的滥用。<sup>[20]</sup>以海洛因为例,使用海洛因致死的情况普遍发生于过量,使得吸食纯度显然高于日常标准而出现生命危机。所以,难以认定海洛因本身具有盖然的致命性。另一方面,毒品与违法犯罪活动之间的关系是否具有高度盖然性,似可再做斟酌。我国有学者指出:“毒品和犯罪是一对孪生兄弟,毒品引起的社会犯罪不断增加”。<sup>[21]</sup>但是,毒品所引发的具体社会危害只是一种衍生危害,并非毒品本身的侵害所致,否则将歪曲法律规范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理论。随着犯罪实证科学的发展,许多研究成果进一步证伪了毒品与违法犯罪活动的因果发展必然性。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蔡鸿文采用系统抽样法,对台北、台中等7个城市的914名毒品罪犯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吸毒者在吸毒以前具有犯罪前科的比例高达62.7%,甚至有31.6%的人自己认为前科行为引发吸毒。在他的研究中,吸毒引发暴力犯罪的比例仅占12.4%,这与许多媒体所宣传的大相径庭。<sup>[22]</sup>

### (三)厘清毒品定义的规范要素

如前所述,法律定义要素须体现客观性与规范性的统一。毒品之所以进入法律视野并被严格管制,不仅仅基于其化学结构、药理性质、医疗效用等自然属性,还掺杂了泛滥历史、滥用规模、社会容忍度、司法资源等人文因素,方能彰显毒品作为一个法律信条学概念,本质是一种以权力为基础的规范甄别。

第一,随着经济性考量成为评估政府行为的重要工具,追求毒品管制效益是社会对政府的基本要求,也是政府禁毒的基本准则。各国对毒品的自然属性的认识差异不大,但对大麻等软性毒品管制态度却形成了鲜明反差,这种分歧可以从管制费效比的角度找到合理解释。实施大麻合法化的国家认为,禁止大麻交易使得黑市猖獗、价格上升、关联暴力和犯罪活动频发,且浪费大量人力、物力。为此,实行大麻等软性毒品商品化,并将此类毒品的生

产、流通和使用纳入正常的市场管理渠道,既可以抵制走私和黑市,也有利于将节省下来的禁毒经费用于戒毒治疗和宣传教育。1976年荷兰通过修订《新鸦片法》承认了持有许可证的“咖啡馆”的合法地位,允许其公开出售大麻制品,大麻制品由此步入“商品化”和“市场化”阶段。目前进行大麻等软性毒品合法化实践的国家还有德国、瑞士、葡萄牙、西班牙、卢森堡等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哥伦比亚、阿根廷、乌拉圭等美洲国家。

第二,历史文化背景也可能触发国家对于某种物质的管制。例如,鸦片在成瘾性、危害性、滥用规模等方面显然不如海洛因和冰毒,但我国从1990年《关于禁毒的决定》到2007年颁布的《禁毒法》,乃至其间附属设置毒品定义的其他部门法,均将鸦片作为典型毒品与海洛因、冰毒等并列,我国台湾地区甚至还将鸦片与后者并列为第一等级的毒品。从清代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禁毒法令中的“烟”与“毒”长期混用,或将“禁烟禁毒”并提,“毒品”一度专指鸦片,而无“鸦片和其他毒品”的含义。尽管历史的风云早已吹散鸦片战争的硝烟,但作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和象征符号,鸦片对于中国人具有某种特殊的意蕴。这种意蕴往往表现为一种屈辱和悲痛的情绪,赋予了鸦片类毒品特别的意义,并长期支配着禁毒政策的走向。正如部分学者所言,“对于鸦片的彻底禁绝态度,对于我国政府而言,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政治使命,而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控制手段。”<sup>[23]</sup>

第三,毒品的列管意味着国家权力介入到社会治理中,为了实现权力与权利的平衡,社会容忍度亦将成为毒品定义要素之一。英国学者彼得·斯坦发人深省地指出:“如果国家强制力所支持的法律并不要求多数人的尊敬,如果相当一部分人准备违反法律并情愿接受他们给予的惩罚,那么,国家的权力也就不起什么作用了。”<sup>[24]</sup>以笑气的法律定性为例,笑气的滥用无疑会带来身体损害,在毒理特征上与其他毒品差别不大。但是,如果仅依据这一点就认为其符合毒品特征,须纳入毒品列管,则显得太过草率与冲动。笑气在食品工业、临床麻醉、汽车养护等领域均有广泛用途,制备笑气的工艺也很简单,社会的容忍度相对较高。如果将笑气纳入毒品范畴将与社会公众的法律认知相偏离。例如,咖啡馆制备咖啡时会在奶泡中充入笑气,在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零容忍”的定罪模式下,这种最常见的社会交易行为一旦构成刑事犯罪,显然超出一般人的违法性认知水平。在一个以

维护和增进全体国民福祉为导向的整体性法秩序评价中,将笑气列管为毒品,将对公众法感情造成极大冲击,显然难以实现公众对毒品立法的内在认同。

#### 四、余论

毒品种类的不断扩大大是导致禁毒斗争复杂性与长期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适应日益艰巨的毒情形势,禁毒法学研究成果中出现了建立我国的毒品分级制度、实行弹性化戒毒周期<sup>[25]</sup>、统一禁毒刑法与行政法<sup>[26]</sup>等意见,并逐步形成学界共识。<sup>[27]</sup>而上述设想在立法上的落实仍需要基础理论的及时跟进,首先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毒品法律概念的重新建构,这既是我国禁毒立法的迫切需求也是可行路径。毒品定义要素作为揭示毒品概念的基本逻辑要件,既要尽可能剥离非理性因素的干扰,还原毒品最本质的客观属性,也要充分考虑毒品的滥用规模、历史渊源、社会容忍度等人文属性,体现法律定义要素的客观性与规范性的辩证统一。联合国早在1978年的《控制麻醉品滥用今后活动的综合性多学科纲要》中就曾指出,毒品的定义“不是以医学或者科学的定义加以划定的,而是从法律的意义上确认为,列入了由国内法或国际法律确定的名单的某种药物。”<sup>[28]</sup>所谓“法律的意义”恰恰彰显了立法者对毒品蕴含之人文属性的规范考量,已经超出了客观属性的一般范畴。

#### 参考文献

- [1] 马爱平.“笑气”可能让你笑不出来[N].科技日报,2017-07-17(8).
- [2] 张代蕾.“笑气”不可笑,英国立法禁滥用[EB/OL].(2017-07-20)[2017-7-18].<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720/c1002-29417986.html>.
- [3] 陈金钊,熊明辉.法律逻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65.
- [4] 张光杰.法理学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22.
- [5] 哈特.法律的概念[M].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6.
- [6] 雍琦.法律逻辑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28.
- [7] 苏珊·哈克.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构[M].陈波,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15.
- [8] 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654.
- [9] 褚宸舸.中国禁毒法治论[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142-144.
- [10] 靳澜涛.毒品概念界定的立法模式比较与选择[J].甘肃理论学刊,2017,(3):117.
- [11] 鲁伯特·克罗斯,菲利普·A·琼斯.英国刑法导论[M].赵秉志,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333-334.
- [12] 蒋和平.毒品问题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61.
- [13] 安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
- [14] 斯蒂芬·E.巴坎.犯罪学:社会学的理解[M].秦晨,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506-507.
- [15] 戴维·考特莱特.上瘾五百年——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M].薛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92.
- [16] 刘建宏.外国禁毒法律概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41.
- [17] 谢侑霖等.评估“管制物质类似物执行条例”施行之可能性[J].犯罪学期刊,2013,(6):47.
- [18] 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M].徐久生,何秉松,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
- [19] 杨鸿.毒品犯罪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5.
- [20] 高巍.贩卖毒品罪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55.
- [21] 蔺剑.毒品犯罪的定罪与量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19.
- [22] 蔡鸿文.我国台湾地区毒品犯罪实证分析研究[D].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刑事警察研究所,2001:129-133.
- [23] 高巍.中国禁毒三十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36-37.
- [24] 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许张润,舒国滢,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75.
- [25] 靳澜涛.毒品合法化政策的理论争鸣与批判借鉴[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6,(5):26.
- [26] 靳澜涛.我国禁毒立法体例的反思与重构[J].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17,(5):17-18.
- [27] 邓益辉.何谓“毒品”,“毒品分级”有多远[N].民主与法制时报,2017-08-24(6).
- [28] 崔敏.毒品犯罪发展趋势与遏制对策[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28.

(责任编辑:闫卫平)

(下转第82页)